

◀（上接 8 版）

然关系的问题。就灾害的影响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规模不一，其活动范围大小不一，因而同等程度的灾害，其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先秦时代灾害少，但由于人口总体规模小，活动范围有限，故而对当时的人类而言，其危害程度相对而言，要比今天大得多。死亡一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先秦时代可以消灭中国文明好几次，而在光绪年间，则只能延缓人口增长的态势。这是其一。其二，就灾害的成因而论，早在1920年代，竺可桢先生就以其对直隶永定河水灾的讨论，非常圆满地解答了葛教授的疑问。他说：直隶水灾为什么在16、17、18世纪以后越来越多？不是因为它靠近都城，也不是文献记载有问题，毕竟三个世纪的记录都是同一处，而且始终处于天子脚下，而是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宋元时期，永定河周边的人口很少，即使河水很丰盛，也不见得形成洪水，更不见得对人造成危害，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去住。但是后来这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同时不停地开垦沿河的土地，离永定河越来越远，而且为防止水患，又不断地筑堤建坝，将河水束缚在狭窄的河道之中。灾害自然越来越多。故此，灾害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威力，另一方面则是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带来的后果。它是人和自然的相互纠结的产物。1950年代谭其骧先生对王景治河之后黄河的所谓“八百年安澜”给出的解释，遵循的实乃同一逻辑。

重大自然灾害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心理、文化或民族素质等方面。我曾经在著名灾害学家高建国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近代110余年造成万人以上人口死亡的灾害进行重新统计，结果发现，这样的灾害，包括水、旱、震、疫、风、寒、饥等，共发生了119次，平均每年在1次以上，死亡总数为3836万人，年均35万人。这在当时的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或许不算太大，但对受灾严重的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实在不可低估。尤其是不少特大灾害，更是惨绝人寰。比如“丁戊奇荒”之后，就是1888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整个河道又向南方摆动。铜瓦

厢决口后，黄河在南北之间如此来回摆动，多达四五次，每一次都是巨大的灾难。1892年到1893年，山西北部地区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年的旱灾，大约又饿死100万到200万人。山西省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之一，明代曾有大量的人口输出，故而在华北各地至今仍流传“洪洞大槐树”的传说。但是经过晚清光绪年间的两场大饥荒，其人口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都未曾恢复过来。今日山西省人口的数量还是要比其他各个省要少得多，可见其影响之深且远。到了民国时期，这样的特大灾害更是接连不断。1920年，华北大旱灾，大约有50多万人因饿而亡。1925年，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大约死了100多万人。1928年到1930年，华北、西北又是大旱灾，适逢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又造成将近1000多万人的死亡。紧接着就是1931年，长江大水灾，死了将近40多万人。1936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四川省发生了一次少为人知的大旱灾，死亡人口100多万。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1942年到1943年河南大旱，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大饥荒，仅河南国统区就死了大概300万人；如果将日本占领区和抗日边区包括在内，死亡人数显然要大得多。与此同时，在华南的广东，也发生了旱灾，估计死亡人数50多万，也有人估计是200多万人。在中国历史上，由饥荒所导致的人口的大规模死亡，简直是司空见惯。对生命的戕害是与对精神的撞击联系在一起的，这无论如何也会给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打下深深烙印。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关注过，而且做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清末在华活动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了《中国人的特性》；著名的地理学家亨廷顿，出了一本书叫《种族的特性》，其中有专章探究灾荒对中国人特性的影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是将亨廷顿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摘出来翻译，名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然后又将这部分内容与明恩溥的著作合并在一起，再加上自己提出的解救之道，编成《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特性当然就是自私，把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只要能不死，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迁就”。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饥荒历练，很多的优秀品质被丢掉了，剩下的就是哪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的这种民族特

性。所以最后，他提出一个别具特色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优生学的途径，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进行改造，来提升中国人对于灾害的防御能力，所以他叫“民族卫生”。每当看到潘先生的这种论述，我总是生发一种联想，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频繁发生的灾荒到底有没有关联？又在多大程度上关联在一起？我在阅读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其通书所谈，很大一部分内容都与防灾救荒相关，尤其是开篇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更是把“黎民不饥不寒”作为王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儒家文化，它的最根本目标还是要确立以统治者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对此种等级秩序进行文化上的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对有限资源非平等分配体系的合法化过程。所谓资源有限或资源短缺，不光指的是日常生活下的常态，更指资源极度稀缺的饥荒时期。我们在相关的史料中经常会看到正常状况下的社会伦理秩序如何被日益严重的饥荒逐步瓦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这样的瓦解过程，也是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逻辑。我们在《万国公报》上面发现一则打油诗，从中可以看到饥荒打击之下一个家庭的度荒之举：在饥荒开始之际，先是千方百计卖东西，卖光了一切就想着卖人了。卖谁啊？首先是媳妇，因为她是外姓人。接下来是女儿，长大了就得嫁出去。然后才是卖儿子。这样一种以尊老为中心的家庭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应对饥荒过程中的残酷。我曾从首都图书馆找到一份文献，是唱戏的脚本，题名《买卖儿子》，实则反映的是人吃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为一对夫妇，上有老母，下有儿子。饥荒之中，母亲又饿又病，眼看快要断气。这对夫妇不忍老母离去，就和老母亲商量杀掉孩子，让老母充饥。老母当然不答应，但这对夫妇还是坚持己见，偷偷杀掉亲生儿子，救活了老母亲。这位老母亲活过来之后见不着小孙子，便到处打听，从邻居那里得到真相之后，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儿媳告上了县衙。但是在审判过程中，所有的邻居都替这对夫妇说情，说他们是为了尽孝，这对夫妇在回答县官审问时则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母亲只有一个，死了就永远不再有；可儿子呢？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在民间，多生孩子往往是一个家庭防备饥荒的手段。所以

才有“添粮不敌减口”“卖一口，救十口”的说法。有关灾荒与儒家文化的关联，新一代杰出的美国中国史家艾志端在她对光绪初年华北大饥荒的个案研究中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见氏著《铁泪图》），这里就不多说了。就灾荒与社会政治秩序或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地方的层面来讲，灾害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普遍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会抹平某一特定地域中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形成一种相互扶助、共渡难关的“天下沦落人”效应，有人称之为“灾害共产主义”。但是另一方面，灾害打击的不均匀分布，又会导致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社区、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之间利害分布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动，又会导致相互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抗。前一种情况，借助于灾害社会学的理论，可以叫做“共识性灾害”；后一种情况，则属于“分裂型灾害”。旧中国横行各地的“土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们平时为农，灾时掳掠，而且总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把抢劫的矛头对准邻近或更远的社区。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饥荒，起义，王朝更替，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条铁的规律。就像邓拓所说的，“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邓拓文集》第二卷第106-107页）。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无不造成旧王朝的崩溃。有清一代，特别是嘉道以来的特大灾荒，也曾引发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民国时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少之又少，但是灾荒期间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饥民暴动仍起伏不断。这些或大或小的农民反抗运动，虽然没有像先前那样直接颠覆清朝或民国的统治，但对它们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认的。有学者往往列举历史上，特别是清朝、民国期间一些看起来与饥荒无关的农民起义的例子来否定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他们往往又忽视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灾害政治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质疑是不是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与灾荒有关联，而在于为什么有的大灾荒并没有引起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即便出现这样的起义或反抗运动，最后也没有导致清朝或者民国政权的覆亡或倒台？或者进一步追问：历经两千多年的王朝兴衰率为什么在此时被打破？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饥荒，这样的起义，未曾导致王朝崩溃，但它们对于近代历史上历次重大战争或政治革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我的导师李文海先生在1980年代中叶倡导灾荒史研究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投入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并且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我们对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我们除了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之外，还需要从人与自然的关 系，或者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来透视人类的活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当前新兴的环境史、生态史的做法了。

人与自然的纠结：灾害成因一瞥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按其不同的物理动力及其来源，可以分为水旱等气象灾害，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蝗灾、鼠疫以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等生物灾害，还有天外飞来的横祸，如陨石撞击等天文灾害，它们分别源于组成地球大系统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以及环绕地球的宇宙圈等。地球上的各大圈层，并不总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个圈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其他圈层相应的变动，导致一系列连锁式的灾害反应。比如旱灾与地震，亦即气象灾害与地质灾害有没有什么关联？1993年，我在李文海先生指导下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的一部分内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华北的大旱灾总是伴随着大地震。例如光绪初年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年，持续四年，但就在即将结束之时，亦即1879年，甘肃发生八级大地震，地震造成今天所谓的堰塞湖，一共死亡了4万余人。1920年华北大旱，是年12月，甘肃海原又发生了一次八级以上的地震，按我们的考证，总共死亡30万人左右，比唐山大地震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多；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同样也有大地震出现。当时很困惑，但也把它写在文字之中。其后，随着自己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了解得越来越多，居然发现，早在1972

（下转 10 版）➡